



# 坚定不移践行“六个力量” 自觉服务国家战略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焦开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努力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六个力量”的要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工业集团）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确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最高战略，把履行好强军首责、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主线，努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新时代集团公司发展方针，抓党建、带队伍、促发展，坚定自觉在服务落实国家战略大局中找定位、强担当、作贡献，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集团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的生动实践。

## 强化学思践悟，坚定正确方向

践行“六个力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向领航是最根本的标准。兵器工业集团党组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党组会第一议题，逐项制定落实措施。今年以来，已分解下达 370 条任务，切实做到学习领会第一时间、任务分解第一步骤、贯彻落实第一要求、督查考核第一内容。健全工作体系、完善落实机制、形成工作闭环，系统梳理部署要求，列为总部部门 A 类目标，列为二级单位年度责任书重点考核内容，推动全集团上下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

## 坚决履行好强军首责，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服务

践行“六个力量”，履行好强军首责是军工集团最直接的体现。兵器工业集团党组强化各级领导班子政治担当，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中争当先锋、作表率。坚持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在科技创新最前沿，构建装备研发体系和技术研究体系，持续深化党员创新工程，选配党员技术骨干成立项目团队，聚焦自主可控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装备体系建设和重点型号研制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一些重点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大幅缩小我国陆军主战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幅提升我军新质战斗力。坚持让鲜红的党旗飘扬在生产服务第一线，落实“交装备就是交战斗力”，按节点保质保量完成军品生产交付任务。在近年阅兵中，兵器工业集团研制生产的装备组成方阵数量超过三分之一，牵头组建技术服务大队，为此专门成立临时党委，把来自各单位的党员集合在党旗下，把党小组建在方队，有力保障了部队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扬国威、壮军威。

## 贯彻新发展理念，笃行高质量发展

践行“六个力量”，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是必由之路。兵器工业集团党组把推动改革发展作为党组织工作和战斗力的磨刀石、试金石，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大任务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建独特优势不断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大力推动北斗应用产业创新发展，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密度最高、全国产化的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网”，短报文服务平台将为千万级用户实时提供位置报告、应急搜救服务，率先实现北斗应用“走出去”，联合兄弟央企成立北斗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共同打造北斗应用“国家队”。大力推动军民工用技术双向转化，硝化棉、人造金刚石等产品的产销量保持世界第一，矿用车、火车轴等产品的产销量保持国内第一。大力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实施困难企业脱困攻坚和驻东北企业振兴专项行动，“一企一策”推动增信心、转机制、调结构、强活力，大部分困难单位扭亏为盈、发展在望。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抓重点、建体系、强监管，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防线；全面完成定点扶贫和革命老区帮扶任务，获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效评价“好”的等次，用心用情用力帮扶困难职工，确保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兵

器工业一个职工也不落下；实施环境保护综合提升专项行动，确保安全发展、绿色发展。

## 当好排头兵，画好“工笔画”

践行“六个力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在前列是应有的责任担当。兵器工业集团党组坚持把保障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作为国际化经营的根本要求，把各级组织和骨干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支点，着力推动各项海外业务协同发展。着力构建市场营销、科研管理、生产组织、质量管控、服务保障体系，一批重大项目签约成交。着力加强海外能源资源战略开发，成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力量。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标志性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入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4年来，兵器工业集团军品任务考核连年名列前茅，全面完成提质增效稳增长任务，军贸出口成交额稳居我国军贸行业排头兵，连续16年获得国资委业绩考核 A 级，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兵器工业集团党组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深化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成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更加坚定自觉地履行好保军强军、支撑世界一流军队建设的政治责任，履行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经济责任，履行好稳就业、惠职工、促和谐的社会责任，加倍努力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贡献。



# 以平常心面对得失

□ 王 杰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果对每件事都斤斤计较、盘算利益得失，那么永远也无法走出名缰利锁的牢笼。当我们学会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时候，就能看到生活的美好。正如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上任时，曾告诫自己的那般：“名利竞如何，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愁雨愁风愁不尽，总是南柯。”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唐朝。唐太宗时期，有一名吏部官员，名叫卢承庆。唐太宗即位后，卢承庆被任命为泰州参军。他上奏河西军情，说得井井有条，很有见地，唐太宗听完之后暗自称奇，认为他善于辞令，便晋升他为考功员外郎。不久之后，由于他工作出色，又升至户部侍郎。

一次，唐太宗向他询问历朝户籍之事，卢承庆旁征博引，从夏商周，一直说到隋朝的人数增减，太宗听完之后再次对卢承庆表示了赞赏，不久又委任他兼任检校兵部侍郎，掌管五品官的选用。但卢承庆并不愿意接受这次的任命，他认为选官是尚书的事情，自己绝不能越俎代庖。太宗听了之后十分不满，对卢承庆说：“我相信你，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之后，卢

承庆获得太宗赏识，历任雍州别驾、尚书左丞。但对官位的连连攀升，卢承庆并没有表现出志满意得，还是像从前一样，认真真处理公务，一点不敢大意马虎。

唐太宗驾崩之后，唐高宗李治即位，因为遭人诬陷，卢承庆被贬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之后又被贬为简州司马，一年之后又转任洪州长史。卢承庆面对小人一系列的弹劾，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懑，他认为官员要为国效忠，不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官职都不应受到影响。在之后的时间里，卢承庆又被召回京城任职，手中权力与宰相无二。随后，又因为工作失误，遭到御史台官员弹劾，再一次被贬为刺史。

如此反反复复、宦海沉浮，但无论是升迁，还是被贬，卢承庆都未曾有过怨言，也不曾计较过自己的利益得失，他始终都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都是在为国尽忠、为民服务。

正因为卢承庆生动彰显了在得失面前宠辱不惊的品格，他的事迹至今被传为佳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当代官员应当也必须具有这样的胸怀与品格。

名利之心、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本无可厚非，关键是以何种心态对待名利。对普通人而言，过于看重得失，无非是世俗一些；但对官员来说，过于看重得失，就容易沉溺于追名逐利、醉心于沽名钓誉，就如同与恶魔合作，腐败之事将会层出不穷。

所以，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应该思考这样一个人生问题：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名利与得失。我们绝不能因为名利与得失而挑战道德的底线、法律的权威。“正确对待名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官员的谆谆告诫。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面对巨大利益时，我们只有不为名利所束缚，不为物质所迷惑，不为得失所干扰，才能以人格魅力与境界修为赢得大众的认同和尊重。



## 党史上的为什么（8）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的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的努力。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928年，党的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同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的以之指导实践。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25年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认为其右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又率军深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结论。他还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如何提出来的

□ 罗平汉

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失败和成功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我们党已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熟练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就这样，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并发表了上述文章，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革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独特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